

隶变视域下的帛书《五十二病方》“非自觉性”探微

付佳维（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马王堆帛书中的《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古医方专著。该帛书于1973年12月在湖南长沙东面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经专家考证，该墓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之子的墓地。在墓穴东侧有一涂漆木匣，现存马王堆帛书均出土于此。隶变时期是古今文字的过渡阶段，该时期的书体似篆似隶非篆非隶，帛书《五十二病方》处于隶变初期阶段，其笔画写法相较于前期篆书有细微变化，针对“非自觉”现象可进行多角度探究。医方作为特殊的书写载体，其在实际场景中的快速书写需求导致波磔弱化，进而加速了隶变的发展进程。隶变视域下帛书在秦汉民间手书抄录字体的发展既规避了程序化和严肃的体例规则，展现出天真烂漫的书写风气，也能对此帛书的文化考证和时期界定有更好的了解，回顾时代融合与文化杂交在书法上的体现。

关键词：《五十二病方》；非自觉性笔画；波磔弱化

一、引言

秦汉之际，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巨大变革，这一时期不仅是中国社会制度的创建阶段，也是思想萌芽的奠基时期。始皇帝宣扬国民认同感，“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在位时间虽短，但其专制治国手段推动了华夏民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汉武帝时期的“汉承秦制”，将统一的理念深入国家发展脉络，在注重文治的同时亦加强边疆安防管理。可以说，秦汉时期是中国在疆域和文化方面奠定大一统格局的关键时期，为国家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帛书《五十二病方》全书约一万字，与其他四种医书共同抄录在一卷帛上，记录了医方两百余种，切实反映了汉初以前医学发展水平及病症处理方式的情况。关于病方的抄书时间存在争议，有西周、战国晚期、秦始皇立国期等多种观点，现大致定位为“秦汉之际”，这也是由于马王堆帛书成书时间跨度较大，书写特点不一致所导致。《五十二病方》所书文字处于隶变初期形态，字体仍然带有明显的篆意，篆书遗留痕迹明显，字体

修长，笔画伸展舒朗，用笔较为细劲挺拔，篆书结构多有保留，同时增加了一些隶书波磔，与成熟汉隶的规范式波磔差距较大，属于刚刚进化的阶段。

丛文俊在《“隶变”问题讨论（上）——从书体问题说到隶变的早期特征》一文中表示，关于隶书早期字体、名称、隶变形式的说法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以“初有隶书”为界定，以诏版文字立论；第二种是以小篆为标准寻找差异，以探寻“古隶”；第三种则是以成熟汉隶为参照比对早期古隶特征，但不够全面^[1]。这些观点均难以完整准确地反映隶书早期的真实面貌。

二、非自觉性书写现象

许慎在《说文解字·叙》言：“秦天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2]”这表明隶书的产生与秦朝统一文字、简化书写的努力密切相关，并延续至汉代继续发展。隶变的核心转变主要体现在四方面：首先，明显的篆书圆转线条分解成方折化；其次，

象形性减弱，但符号性增强；再次，出现“蚕头燕尾”的雏形；最后，部件发生重组，体现在偏旁部首的合并与分化。

帛书《五十二病方》既保留了秦代书法的遗绪，又展现出汉代书法的新风。马王堆帛书一般被界定为古隶，由于其文字时期跨度久远，现学者将其主要划分为三至四个时期，《五十二病方》被定为隶变的初期形态，处于篆书到隶书的最初过渡期。其形体偏长，仍具篆书特征，笔法中又带有一些隶书笔意。在书写过程中，与秦代篆书相比，更加注重线条的变化和结构的组合，富有艺术趣味性。拉长的笔画中已出现早期的“波磔”笔意，但与成熟时期的“左波右磔”相比，此时的波磔更具随意性，左右皆有，使整个字的结构充满灵动变化。整篇作品的章法布局也是彰显轻松自然，书手在作书时也融入了个性化表达和性情发挥，整体呈现出丰富饱满的艺术效果。由于帛书书写材质丝帛的特殊性，书手需控制书写速度以防止笔画晕染和渗透，相较于竹木简牍，帛书的质感更为柔软温润，减少了硬挺的笔画质感。此时书法风格的演变过程与秦汉文化交接变迁相呼应，既体现了“汉承秦制”的延续性，未脱离秦代文字的总体式样，又蕴含时代新变，融篆隶于一体，呈现出古雅生动的艺术气质。

帛书中出现了“横线趋直”“折线变直”“斜线拉直”“竖线趋向横线”“连点成线趋直”等多种“趋直”笔画，这些笔画不仅体现了篆书弧线趋直的现象，还继承了篆书字形的长方特征，同时展现出隶变后用笔平直方折的特点。其逐渐分解篆书结体，将弧线平直化后横向延展，有些笔画的演变尚不够稳定，这也是隶变初期文字发展不确定性的体现。“化长为短”，字形逐渐趋向方扁发展，线条的延长和缩短伴随笔画的曲直而发生，整体字势在形态变化中呈现出横势趋向。隶变过程中点画的连断也是表现篆书解体的方式之一，连断与断连之间出现了字形的重新排布，草

化现象或许是点画断连产生的原因。笔画转折之间的圆转和方折，在《五十二病方》中展现出化圆为方的弧度处理（图1），过度形态尚不成熟，略显生硬^[3]。其实，严格地说，马王堆帛书都是由隶书抄写而成，只是这些隶书或因抄手的不同，或因抄写时代先后有异而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貌。我们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一种字体的确认，不只是看它的字形结构，而主要是看它的构形取势和点画线条的具体形态^[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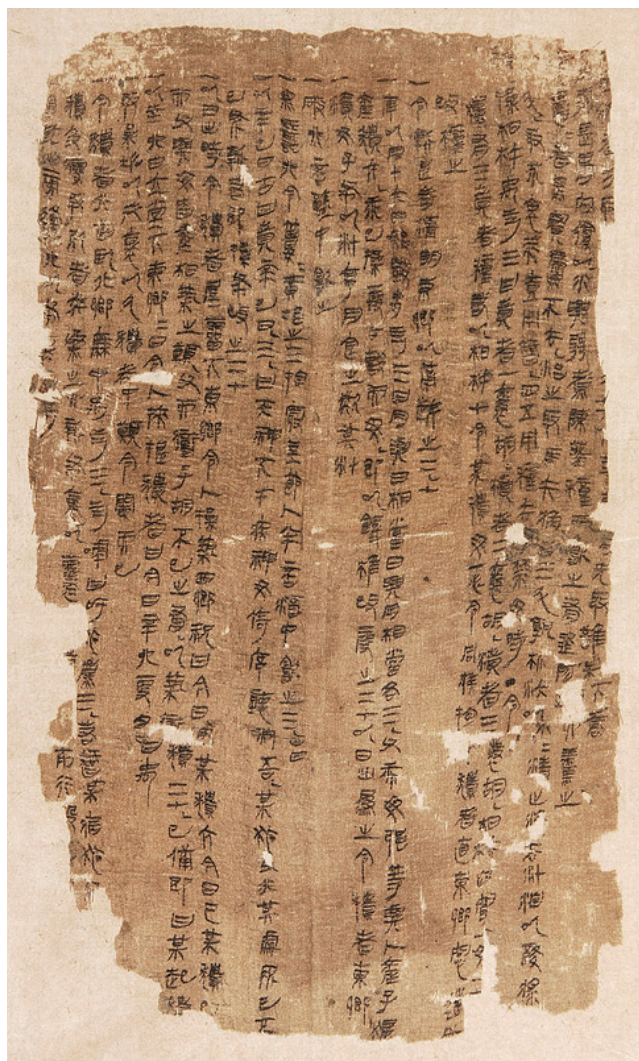


图1 《五十二病方》帛书（局部）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秦朝以法家治国，富国强兵，扩张国家版图，最终实现统一六国，成为中央集权的国家。至汉初，汉朝统治集团吸取秦朝灭国的教训，信奉黄

老无为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财政支出，缓解经济压力，使社会逐渐恢复繁荣。此后儒家地位不断提升，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此时经济繁荣，国家政治稳定，文化统一，整体国力稳步上升。

在实际情况中，医书书手并未过多关注书法艺术的规范，而是更注重医学记录或传播翻阅的实用性。为追求快速书写，字形的波磔特征逐渐弱化，这也成为医方这一特殊性体裁对书法书体演变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帛书《五十二病方》中篆书向隶书的简化趋势，也体现了秦汉时期对效率和实用性的追求。篆书字体偏长，书写范围被拉长，而人们在识读时视域同样是由上至下的扫视，因此识读性和书写便捷性共同促使着字体的演进，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走向。此时在《五十二病方》中的字形尚未发生很大的改变，仍保持偏长形态，但是笔画已变得较为随意，相较于秦篆，尤其是官方使用的《峰山碑》样式篆书，更为灵动。文中也出现了一些起笔和收笔的出尖，笔画方圆并举，用笔疾涩得宜，巧妙地表现了用笔力度和速度。笔画线条细劲挺拔，沉着而富有力度，整体风格活泼而不失稳重。该时期的笔法趋于成熟，灵巧自如而较少采用夸张的俯仰向背之势，笔势强弱变化分明，字距布局疏散宽松，加之笔画的适当延伸，共同奠定了整篇作品的灵动气韵。

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提出：“传邈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称善，释其罪而用为御史，以其便于官狱隶人佐书，故名曰‘隶’。”^[5]《五十二病方》的字体与《秦金文录》《诅楚文》等秦铭文相仿，基本属于秦系小篆文字范畴，其中有些文字结构类似战国早期的楚国文字。秦汉文化的前后承接与书体的演进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五十二病方》字体的演变便是有力的证明，字体的简化体现了秦汉时期对高效书写的需求，此时过渡阶段的书体则

是书法在时代传承过程中的自然流转。

三、文化融合中的非自觉性

《五十二病方》中的文字结构既有秦系小篆的特点也有战国时期楚文字的风格。2007年，学者张正霞在《帛书〈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考证》中，从内容、文字、语言等方面分析，认为该帛书成书年代大约为战国末期。首先，通过与医书《黄帝内经》比对可知，现大多观点认为《黄帝内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而在《五十二病方》中许多病名未见于《黄帝内经》，用药剂量也不精确，且未采用秦汉之际以度量衡记载的方式，以此来推算《五十二病方》最晚也是在战国末期。其次，帛书中的篆字不同于秦统一后推行的标准小篆，与战国秦墓青川木牍对照极为相似，并且一些具体的文字使用相较于汉代以后不同。再者，在语言使用方面，其风格与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晏子春秋》相近，口语性极强，部分用词还带有楚地方言色彩。以上三点论证了《五十二病方》的成书年代在战国末期至汉之前^[6]。

此外，《五十二病方》与战国青川木牍在文字形态上呈现出的相似性，也反映出战国早期楚文化的渗透与影响，并且上述学者在文中指出，帛书文本内确实存在楚地方言文字，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前述观点。青川木牍于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郝家坪第50号战国墓出土，其记载了秦武王时期更修田律、修改封疆、筑堤修桥等六件大事，是研究先秦土地制度与历史事件不可或缺的珍贵材料。木牍字形较为简练，结构紧密且无过多复杂的笔画，朴实中透着干练，这既反映了楚国人民朴实直率的特质，也侧面体现了楚文化的特点。其篆书结构明显，整体呈现笔画内收，但外部轮廓却丰富多变，整篇与《五十二病方》一样具有灵活的动态美；线条劲健流畅呈弧形，用笔锋芒毕露，多有尖峰起收，横画平铺张开，呈现左右伸展的姿态，同一笔画之中提按顿挫明显，与篆书均匀的线条有所不同；章法上排列多样，

摆动性很强，布局灵活，整体舒朗轻松而单字又显紧密，这种灵活多变的章法布局体现了楚人在书法创作上的审美自觉。

帛书《五十二病方》在文字上受到了楚文化的影响，其章法整体较为轻松舒朗，字距宽松而行距紧密，但与青川木牍不同的是线条更为细劲挺拔，出现一些拖长的笔画，拉大字与字之间的距离，形成一种灵动活泼、富有生气的感觉，这种似隶非隶又似篆非篆的书写效果，也是篆书向隶书演进的进一步体现。这种文字的相似性，不仅体现了秦国统一文字的趋势，也显示了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这种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不仅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书法的融合演进及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可以说，《五十二病方》是秦汉时期或秦以前文化交流与医学方面融合的重要见证。

四、非自觉性社会需求

马王堆帛书中除了汉字还有婆罗迷文、吐蕃文等其他域外文字，这为探究当时境外交流、文字互通、文化交融现象提供了有利条件。帛书内容涉及军事、经济、民生、医疗、艺术、地理等多个领域的大量信息，是研究汉以前乃至汉初时期极其宝贵的文献资料^[7]，由于出土帛书的分类方式不固定，大致出土文字十二万余字，内容涵盖众多学科，信息含量巨大，资料丰富，对研究西汉初期社会文化、阶层生活、人文风俗、对外交往等方面具有重大研究价值。此外，该书还补充了秦汉之际通行文字之外的百姓日常手写样式材料，丰富了书写的多样性发展，也为探究当时民俗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更具真实性的依据，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不可估量。

帛书《五十二病方》全书达一万余字，多有残破，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医书内容最丰富的一种，涉及疾病类型众多，其中记载最多的是外科疾病。此类型帛书的出土，对考证秦汉之际的医疗水平和外科技术具有重大作用，其医方内容涉

及内科、外科、灸方、慢性病防治等多个科目。此帛书记载的方剂和疗法，不仅反映了秦汉时期的医学知识，还包含了楚地的医疗实践和药物使用，体现了不同地区医疗知识的交流与融合。

帛书中部分医方反映了南楚地区风俗，其中包含巫术的运用。《五十二病方》中记载有巫方34项，包含了祝由方31方^[8]，祝由术是古代一种精神疗法，属于以咒语画符为特征的迷信道术。帛书中的这些祝由方，非单纯采用祝由之法，不只是祝由，而是常配合其他巫术使用，如“画符”“禹步”“操筑”“敝帚”“扫除”“鼓”“置”等，或结合心理暗示，如面向东方等，或者配合具有一定医疗效果的治疗措施。有些祝由方虽未出现“祝由”“祝”等字样，但其内容包含祝由元素（主要为诅咒），或直接载有祝辞、咒语，并涉及喷（吹）、吠、唾、呼等行为^[9]。诸如此类多处出现祝由和巫术的使用，反映了先民在医疗技术尚不发达之际，对身体康健、疾病去除的美好愿景。尽管巫术本身不值得提倡，但在先民心中，它曾是无比神圣纯真的精神寄托。

此类帛书的记载对于医疗技术的传承具有重要价值，其中一些病方或理论在现今社会仍在使用。它们不仅是先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更是生存经验和劳动技术演进的传递，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民俗中存在的禁忌与风气。这些蕴含战国楚文化风貌的医方文献虽出土于汉墓，却实为跨越秦汉两个时期，经抄录与流传而得以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不仅证明了书法艺术以文字作为载体流传下来的价值，反映了秦汉时期文字统一与演变的过程，更体现了不同地区医疗知识的交流与融合。

五、结语

隶变视域下的《五十二病方》“非自觉性”探究基于书写效率的提升和字形简化之间相辅相成的突破，选择医方这类特殊体裁的书写载体，更能掌握民间书手非专业性的发挥，从而侧面呈现

个体演变在整个变形过程中的推动作用。从书写现象、文化融合和社会需求三个方面来探讨帛书《五十二病方》的非自觉性发展，存在一定的偏颇与不充分之处。然而，这种非自觉性的演变具有一定的史学和理论价值，其形成的新范式并非依赖于上位者发号施令或文字学家引导（当然彼时并未出现明确的文字学方向），而是依靠群众性实践积累与无意识驱动而呈现新面目。这种由下而上、非自觉的文字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文字实用功能的迫切需求，也为后世隶书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其研究对于理解汉字演变的内在动力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帛书《五十二病方》是书法艺术性与实用性双重价值融合的证明，更是秦汉之际文化交流与融合、民生风俗与地域互通、医疗科技和病方记载的明确展示，其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均需我们深入考证。其中，帛书书法处于篆隶之间，为隶变初期阶段，是探究隶变发展进程的有力证据。秦汉之际文字从古文字向今文字过渡，隶变过程中象形性逐渐降低，笔画由圆转加入方折，民间手书的随意性发挥更能印证书体演变的发展方向。作为隶变早期发展阶段，其主要以半篆半隶构件为主。随着隶变深入，逐渐向完全隶变演变。早期隶书出现了草化现象，主要表现为连笔书写、笔画和构件的省简，但此时尚属草书的萌芽状态。对《五十二病方》隶变字体研究，可得知隶变早期点画的线化和笔画化，以及字体的繁化、简化和同化与异化。将其置于隶书整个发展过程中，仍处于萌芽阶段，尚未完成，仍在不断演变^[9]。

沈曾植曾指出“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蹟。^[10]”书法纯朴自然，古秀灵动，抄录时期跨越多个朝代更替，而处于转变期的书体更值得我们多加关注。与成熟之际相对古板的样式相比，这类书体蕴含更多的趣味性

书写与书手情感的真实流露。这册古老的病方，凭借丰富的方剂和独特的治疗方法，展现了秦汉时期医学知识的深厚底蕴和楚地文化的鲜明特色，其非自觉性的演变和简化是书法实用性与快速书写需求的体现，更能反映秦汉时期文化的融合与交流，其价值远超单纯的医学范畴。它以其独特的书法风格，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书法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也让我们得以窥见秦汉时期文化的辉煌与深邃。

参考文献

- [1] 丛文俊.“隶变”问题讨论（上）——从书体问题说到隶变的早期特征[J]. 历史教学, 1992(8): 36-37
- [2] 许慎撰, 徐铉杨校定.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3. 12.
- [3] 廖敦涛. 帛书《五十二病方》隶变的形态研究[D]. 湘潭: 湖南科技大学, 2022.
- [4] 陈松长. 《马王堆帛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315.
- [5] 张彦远辑录, 范祥雍点校. 《法书要录》[M].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 [6] 张正霞, 辛波. 帛书《五十二病方》成书年代考证[J]. 文物春秋, 2007(6): 68-70.
- [7] 田华璞. 浅谈秦汉简帛书法之创作体会[N]. 大河美术报, 2024-6-21(9)
- [8] 周德生. 探讨《五十二病方》的慢性病防治思想[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5, 35(8): 1-4.
- [9] 贾海燕. 《五十二病方》中的巫术与民俗[J]. 中华医史杂志, 2010(2): 114-119.
- [10] 沈曾植. 海日楼题跋（卷二）[M]. 北京: 河洛图书出版社, 1975.